

〈特集企画〉

2015年度国際問題研究所講演会「戦後70年を振り返る」

戦後七〇年回顧 日治時期台灣歷史的記憶及其歷史意義

薛化元

有關日治時期台灣歷史的記憶問題，在正常的狀況下，主要討論的應該是日治時期台灣歷史的反思與意義。雖然歷經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台灣也在1997年開始名列美國「自由之家」評價的自由國家之林。但是，台灣受限於長期國內外的政治情勢，仍然不算是正常國家。而在歷史記憶方面，原本大中國主義的文化霸權並未消散，仍然相當程度支配台灣住民的歷史記憶。因此，在台灣這個主題必須先正視歷史記憶的回復工程，才能進一步討論日治時期台灣歷史的意義。



薛化元先生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一、喚回日治時期的歷史記憶 ——從二次大戰期間的台灣大空襲展示談起

有關台灣歷史教育的爭議問題，從2014年到2015年兩年來有關「微調課綱」的爭議最受矚目。在台灣史的部分，微調課綱是在沒有任何一位在歷史系專任的教師，沒有任何一位在中央研究院歷史相關研究所專任研究人員參與下，由非專業的小組，不循正常程序，在過程不公開的情形下大幅調整的課綱。而面對要求尊重專業、合乎程序的歷史教育內容的訴求，教育部的官員卻不願正面回應，反而以尊重不同史觀、尊重多元價值為名，企圖混淆批評者的改革要求。

站在台灣歷史的觀點，由於目前台灣島上的住民，來台灣的時間先後不一，不同的家族也有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這是台灣多元文化資產，也豐富

了台灣文化歷史的內容。但是，正由於多元的歷史記憶，所以強將某一族群的記憶加在另一族群的歷史記憶上，並視為是歷史的真實，不僅是強暴，而且是對台灣多元文化的不尊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從尊重多元文化的意涵，也是說在合乎歷史事實的時空脈絡中，呈現出當時歷史事實的一種方式，因此，呈現、尊重台灣過去發生的歷史，是呈現、尊重台灣多元歷史、文化的重要條件。如果，以尊重多元文化、價值為名，試圖扭曲甚至掩蓋過去台灣過去發生的歷史事實，則無法逃避破壞台灣多元歷史、文化的罵名。

就以今年在台灣南、北巡迴展示的台灣大空襲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來看，在1945年以前的歷史脈絡，以1944年到1945年來說，當時台灣島上的人民的記憶與在中國大陸上人民的記憶當然不會一樣。就當時台灣島上的多數人而言，是作為日本國的國民，正在遭到盟軍大空襲的威脅與傷害之中，而在中國大陸的人或許正是作為盟軍的一員，或是站在中國的觀點，正在進行對日抗戰過程，這兩種的歷史記憶當然是不一樣。就此而言，在歷史教科書的中國現代史脈絡，呈現當時中國大陸人民與日本作戰的歷史事實，或是當時到中國大陸參與跟日本作戰的台灣人、美國人的歷史固然是適當的，而且也是合乎歷史事實。相對的，在台灣史的脈絡中，則應該呈現當時台灣島上的住民面臨大轟炸的歷史，這也才是尊重當時歷史事實以及當時台灣島上住民歷史經驗的一種呈現方式。

但是，台灣長期以來的歷史教育，基本上是中國為軸心所展開的歷史教育，早期甚至根本台灣史連配屬的角色都沒有，幾乎完全是中國史壟罩的狀況，後來雖然的主體性逐漸出現在高中歷史課本中，台灣歷史所佔比例也逐漸增加，但是對沒有機會接受台灣史教育世代的人而言，台灣史基本上是陌生的。從去年到今年發生的微調課綱的爭議，其中的重點之一，就是雖然好不容易有一些以台灣為歷史場域的論述，微調課綱卻強要在台灣史的歷史脈絡中，加上中國歷史舞台的內容，因此不僅時空容易錯亂，甚至產生嚴重的扭曲。以微調課綱而言，基本上在台灣史（而不是中國現代史）的脈絡中，刻意放大、強調在1944年1945年間在中國參加跟日本作戰的台灣人的歷史，相對忽略了台灣島上發生被盟軍大轟炸的歷史內容，便是一個嚴重的歷史時空錯置的現象，不僅不尊重台灣過去發生的歷史事實，也抹煞了台灣事實上歷史、文化多元的狀況。站在台灣歷史時空的脈絡中，不僅未能使其如實正

常的出現，反而是造成一定程度的扭曲，而這樣的扭曲，實際上是比較合乎兩蔣時代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教育，也就是在某種程度上，抹滅台灣人歷史記憶的一種歷史教育。

還記得早年在某個國立高中曾經出過一個考題，「在二次大戰期間曾經有哪個國家的飛機轟炸過台灣」，當時就有老師（不只是學生）堅持一定是日本來轟炸台灣，站在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是何等的荒誕不經，根本嚴重的傷害了歷史教育的基本原則。前述這種微調課綱對歷史時空的混淆，雖然比不上，也不像這個故事的荒誕不經，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以自己的價值與意識形態來扭曲其他人的歷史記憶。這對台灣歷史、文化多源而且多元的特色，也是本質上的不尊重，更不利多元價值的共存與發展。

站在台灣史的角度，提供現在台灣島上的台灣人，知道1944年到1945年間台灣由於日本已經失去台海制空權之後，而面臨盟軍大轟炸的威脅，這是歷史事實。而台灣在1944年，特別在1945年面對盟軍的大轟炸造成嚴重的傷亡損失也是歷史事實。透過這樣的圖片檔案的展覽，從南到北，再由北到南，在某種程度上，實際上是提供台灣住民，特別是早些年來，從來沒有機會接受台灣史教育的台灣住民，除了家族口耳相傳以外，重新去認識過去從未記憶起的歷史。過去台灣歷史的這種失憶現象相當令人遺憾，現在透過展示台灣當時遭到盟軍大空襲嚴重破壞的歷史事實，這樣子實際上才是尊重歷史、還原台灣多元歷史文化可能的一種方式。

因此，這一系列大空襲的歷史展示，對台灣的歷史教育，實際上也有現實而且重要的意義，只有重新記憶起過去曾經發生在台灣島上的重要的歷史事情，以台灣島作為一個舞台重新建構台灣的歷史記憶，如此呈現台灣多元的歷史記憶，也才有存在的可能。今年巡迴展示的台北、高雄在日本時代也曾經是政經、工業跟軍事的要地，當年也遭到了盟軍相當慘烈的轟炸。在透過展示來認識這段歷史的同時，我們更要省思，因為能夠有機會來認識台灣的多元歷史，實際上是過去幾十年來政治文化社會改革運動好不容易得到的成果。如果我們的歷史教育不能夠呈現這樣的結果，反而是類似微調課綱，以政治的意識型態凌駕專業，捨本逐末地刪除共同的歷史記憶，甚至強加一些原本是存在另一個歷史時空的內容，都是令人感到遺憾的事情。期待未來台灣島上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如實地記憶起自己的歷史記憶，而能夠在合乎歷

史事實的時空脈絡中，跟我們下一代的子孫一起分享台灣多元的歷史文化傳承。

二、日治時期的歷史評價問題

如前所述，日治時代的歷史發展，是台灣歷史重要的一環，也是微調課綱下，台灣歷史教育爭議甚大的一部份。針對目前台灣歷史教育此一時段的爭議，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面對殖民性與現代性的雙重變奏問題。

長期以來，台灣的歷史教育，對於台灣歷史本身相對忽視與不足，是2000年以前長期存在的狀態，雖然，在1990年代末期，針對此一問題推動改革，但具體成效的展現則必須直至兩千年後。至於推動改革之前，在歷史教育中提到的日治時代，主要注重在殖民壓榨的側面，對於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相對忽視。

由於日本是個近代帝國，取得台灣之後，其統治的政策之一，即是積極將台灣納入日本帝國圈內的一環，朝向營造社會、經濟、文化共同體的方向前進。此一發展，單單就經濟層面而言，就必須推動近代資本主義的基礎建設，從關稅、度量衡、貨幣等皆朝向與日本本土一致性的方向發展，而針對土地調查，舊慣調查等基本基礎調查的部份，也是作為有利於殖民統治的需求而展開。不容諱言的，這些基礎建設、制度建立及行政調查工作，對於台灣從前近代往近代社會發展的歷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特別是包括鐵路、公路建設的發展，讓台灣形塑成經濟共同體的要件開始具備，這樣的狀態是日治時期相當重要的歷史發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本統治當局，單單為了統治的便利性，對於基礎教育以及技職教育就必須投入相當的心力。而這種以統治者的利益為本位的政策，在另一方面對台灣近代文明的普及和演進，都有正面的效果。而引進近代文明的另一個側面，則是對於近代自由、民主、人權及其他近代文化的重視，這樣的近代文明的引進，也使得台灣菁英對日本統治政策產生了不滿與批判。而基本上正是透過日本當局推動的近代教育，來提供這些不滿與批判論證基礎的可能。就此而言，殖民性與現代性並不是二元的存在，而是存在著雙軸並重互為辯證的可能性。

三、抗日與政治抗爭

如前所述，台灣在日本近代教育引進之後，產生了對日本殖民政策的批判與反抗的可能，這和1895年日本取得台灣，基於素樸的保家衛國，起而武裝抗日，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這一種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甚至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政治抗爭，究竟與一般所謂的抗日之間存在何種關係，是值得關注的。

針對此一問題，有必要先釐清本文所謂抗日的意涵。這與一般泛稱抗日的意義並不太一樣，而是對應韓國對日本統治時期所謂抗日的意義。就此而言，如果將抗日定調為反抗日本統治，或是明白一點說，是脫離日本統治而追求台灣的政治主體性，乃至試圖與中國近一步的連結，對照韓國的狀況，稱為抗日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問題是，台灣的政治菁英在1920-1930年代，對台灣殖民政策的批判與反抗是否呈現此一樣態，則有待近一步的考察。簡單而言，除了少數強烈主張台灣應脫離日本獨立，或是重新與中國結合的政治主張之外，當時台灣菁英對日本殖民體制的批判或是改革的訴求，是否稱為「抗日」，有再審酌的空間。

而主張脫離日本，再與中國結合的這種政治主張的實踐，則往往透過進入中國與中國政權體制進行互動，希望完成此一結果。不過，這一部分基本上要等到1937年以後，才較為明顯而且也可能為中國政府所接受。另一方面，強調台灣殖民地解放脫離日本，則是以台灣共產黨為主，強調打倒日本殖民統治，建立台灣共和國的政治主張。此一政治主張，並非台灣共產黨所獨創，必須回到第三國際的脈絡中來考察。從列寧到史達林都強調，反對殖民地解放、獨立是違背馬克思（馬列）主義的路線。因此，當時透過第三國際的決策，包括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乃至日本共產黨指導下的台灣共產黨，皆主張台灣應透過殖民地解放運動，建立台灣共和國。就此而言，主張台灣應該脫離日本左翼運動者和主張與中國結合的人士，在日治時代台灣政治運動上是相對少數。更多數人採取的是不一樣的 political 路線，包含他們本身由左到右政治光譜的領導人物，蔣渭水到林獻堂、楊肇嘉，是另一個側面的發展。

這一個側面的發展中，運動的主軸是在日本統治台灣或者是台灣隸屬於

日本帝國，這樣的基礎下展開的。換言之，這一側面的政治抗爭，固然批判殖民統治體制，甚至要求改弦易轍，揚棄殖民統治體制，不過，並沒有主張推翻日本在台灣的統治，或是主張台灣應該脫離日本。這樣的政治路線與前述的抗日的訴求，有根本性的差異。就此而言，它應該介於前述脫離日本的抗日運動，以及支持日本殖民統治的政治主張之間的光譜位置，稱為政治抗爭或許比抗日，更能清楚描繪此一光譜的狀態。

從1914年台灣菁英展開明顯的政治抗爭開始，一開始強調的雖然是主張「同化」，但是核心的訴求就是針對以台日文化不同而採取殖民統治而發，潛在的主張就是撤廢「六三法」。主張台日同化不是合乎日本殖民者的利益嗎？為何台灣總督府要壓制「同化會」？這與台灣菁英試圖透過「同化」的訴求，批評當時的殖民體制，進而改善「六三法體制」下台日不平等有關。「同化會」既被台灣總督府壓制，進一步直接要求撤廢「六三法」是台灣政治抗爭路線的歷史發展。問題是，要求「同化」的團體在台灣都無法在總督府統治下存立，遑論主張撤廢「六三法」。因此，其後的撤廢「六三法」運動，轉到日本本土的東京展開。一方面，在日本憲法保障下，台灣菁英在東京擁有較台灣更多的言論、結社自由。另一方面，當時熟悉日本憲法體制和近代思潮的台灣菁英也多數在日本。

由於六三法是台灣跟日本處於不同法律支配下的制度性依據，撤廢六三法在本質上，就是日本法律領域延伸到台灣的主張，就此而言，相當程度上是屬於內地延長主義的性質。而在一次大戰以後的民族自決風潮中，這一批的台灣政治菁英，大部分揚棄了原本要求撤廢「六三法」體制的主張，轉而主張在台灣成立殖民地議會。這樣的主張固然不是民族自決運動，但卻意味著台灣人的自我覺醒，理解台灣與日本處於不同時空條件，強調台灣的特殊性必須予以延續及強調。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台灣與日本內地徹底整合，縱使台灣人能選出日本的國會議員，以人口比例而言，在日本國會中很難做出合乎台灣特殊需求的法律規範。相對地，如果在台灣維持原有的「六三法」體制狀態，而將原屬總督的律令制定權移轉，交由台灣住民選出的議會，來決定台灣實施的法律制度，對台灣而言相對有利。只是基本上這樣的主張所呈現的台灣人認同，和主張脫離日本統治的政治路線，是有本質上的差異。

四、認同的差異性

基本上，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多多少少都認知到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差異，或者是本島人與內地人的差異。其中，凡是主張台灣應該脫離日本統治，無論是否主張台灣獨立，在基本的認同上，就是認為台灣人不應該作為日本的國民，在這樣上來區隔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差異。相對地，前述的政治抗爭的路線，則是意識到在日本國民的架構下，本島人與內地人，或者是所謂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存在的相當程度的差異。這種認同是認識到台灣人與日本人的不同，但是，在整個國家層次的認同上，則是作為日本國的國民而存在。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縱使主張台灣人不應該強烈批判日本的殖民統治政策，反對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或是認為台灣人應該協助日本人統治的這樣政治立場的人，對於台灣人（本島人）與日本人（內地人）的差異，也有一定的認知。其中最明顯的如辜顯榮，他意識到台灣人的處境，即本島人的處境跟日本內地人的處境，有相當的不同，更不用說台灣島與日本本土處於不同法律的差別。在這樣的歷史時空脈絡，才能了解辜顯榮為什麼會捐款贊助設立台中一中，為什麼會捐款支持在日本批評台灣總督府統治的《台灣青年》，為什麼辜顯榮跟台灣總督府官員的溝通，在日本領台多年後，必須要找翻譯，甚至辜顯榮為什麼在台灣要推動所謂漢文化的延續的發展，甚至找了中國漢學家來台灣進行漢文化的推廣，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身為台灣人的悲哀的一種殖民地烙印傷痕的呈現吧。

除此之外，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在認同上還有另一種特殊的現象，台灣人對 nation 和前近代血緣式的「民族」的認同出現歧異的現象是相當常見的。也就是縱使台灣人認知到，台灣與日本處於同一個國家的狀況，但是台灣人心目中，還是有一個文化上或是血緣上，認為與漢族是同一民族的想像，這可以說是一種虛擬的，但是卻在現實上產生效果的民族想像。如林獻堂，他基本上對於台灣人作為日本國民這一件事情並沒有太多意見，但是對林獻堂來講，之所以發生祖國事件，也就是林獻堂到中國說回到祖國這樣的表態，實際上是他心中仍然有漢族這樣一種的血緣式，或前近代民族認同的因素存在所致。

以上所言，也就呈現出日本統治時代，台灣人認同呈現的多樣而且複雜的狀態。這種複雜的認同狀態，如果配合文化的認同來看就更為有趣。以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重要領導人蔣渭水為例，他的「臨床講義」深刻體驗到台灣的文化原本是有漢文化的傳承，甚至把炎黃子孫這樣的脈絡，都作為台灣整個文化的傳承的重要的一環，但是他的文化認同卻是近代的西方文明。也就是說承認過去台灣的文化，是來自於漢文化的傳承，但認為台灣文化未來的發展，是要引進大量的近代西方文明，那這樣的文化認同，很明顯的又和我們所熟知的強調漢文化的認同是有差異的。在日本時代，擁有漢文化認同或者傳承的菁英，實際上未必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而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菁英，在某種程度上，常引用的依據也未必是漢文化傳承，而常常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內涵的價值。

相較於朝鮮人（韓國人）的國家認同，台灣與朝鮮（或者韓國）在日本統治時期，有一個根本性的差異，就是朝鮮人有亡國之痛，他們的國家，被日本以合併為名兼并，但台灣人本來就沒有國家，就相對那個國家亡國之痛是淡薄的。所以對日本統治時期的朝鮮人來講，如果抱持著朝鮮或韓國的國家認同，不僅是反對日本的統治體制，甚至於對於他自己作為日本人（國民），這樣處境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日本統治時期，主張朝鮮人應該追求和日本人之間的平等，或是在日本統治體制下追求朝鮮人的地位改善，站在韓國或朝鮮的民族主義的立場，是必須加以批判的。相對地，在台灣不僅主張設置殖民地議會，被認定是反抗日本人統治的象徵，甚至連主張內台平等、撤廢六三法的主張，在過去也曾經被認為是抵抗日本統治的重要路線，這樣的評價很明顯的與前述的韓國或朝鮮的狀態有根本性的差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和當時的國際情勢有關，因為中華民國（中國）和日本是正式的邦交國，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直到1940年代之前為止，根本上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是認定台灣是日本國的領土，而且在台北設置了總領事館，換言之，站在中華民國基本立場，則是認定一般的台灣人是日本國的國民，承認台灣屬於日本領土這樣的基礎下，來展該雙方的關係，這樣的狀況之下，自然會影響到台灣人當時抗爭的歷史定位。舉一個例子，辜顯榮在日本時代是被認為是總督府重要的協力者，可是他對於當時的中日外交關係，有相當的貢獻，他過世以後，國民政府頒發褒揚令給他，就此而言，如果站

在所謂台灣人是中國人的立場，根本無法解釋這樣的歷史現實。

五、戰後處置與戰前記憶的反思

1945年二戰末期，日本政府喊出一億人玉碎的主張，這個一億人除日本本土之外，明顯是包括台灣、朝鮮等地人民在內。可是在戰後處理上，日本卻把台灣人排除在前述的一億人的範疇之外，認為在1952年台灣人已經失去日本國的國籍，所以無論是軍人的撫恤、愛國公債、存款的處理，都不能比照日本國民來處理。這樣的狀況，當然就影響到戰後世代的台灣人對戰前記憶的認識與再檢討。

其次是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政府很清楚地認知，台灣人在1945年以前的國籍是日本，因此，排除戰後漢奸處置的適用，而以戰犯處理台籍人士的戰爭責任問題。可是，以處理辜顯榮跟林獻堂為例，前述的辜顯榮過世的時候，當時國民政府給的是褒揚令，可是1945年10月25日以後，對陳儀而言，像林獻堂這些在日本時代被認為是有對抗總督府體制的代表人物，則視為所謂皇民的一部份，這樣子跟台灣民間社會的歷史記憶就出現了嚴重的違和感，這也是戰後初期台灣發生社會、文化衝突問題的重要背景。

再者，必須指出的，最晚在蔣經國時代，對戰前台灣歷史的認識，有了一定的轉變。與韓國政府戰後對日治時期朝鮮人政治抗爭的歷史評價截然不同，透過當時有限的台灣歷史教育，或是大眾傳播媒體傳達的歷史知識，國民黨當局對於日治時期台灣人政治抗爭的歷史解釋，對林獻堂或是蔣渭水批判、反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體制和殖民統治政策，是以「抗日」定調的。此一歷史定調，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國民黨當局的歷史解釋和台灣民間社會記憶沒有出現重大分歧的部分。

問題是，回到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脈絡，除了主張台灣脫離日本統治之外，採取不同政治路線，對台灣總督府體制或是日本殖民政策採取批判、反對立場的台灣菁英，若只是用「抗日」帶過，是否反而忽略了歷史的多樣面貌呢？！

和文全訳

戦後七〇年回顧 日本統治期の台湾の歴史に関する記憶の再考を中心に

薛 化元

(訳：張 政傑)

戦後70年の歴史を回顧するにあたり、日本統治期の台湾の歴史の記憶問題に関する主要な問題は、歴史的な記憶の喪失と錯乱だと思います。これは、台湾の文化と教育の領域において始終優勢を保っている大中国主義の文化覇権（文化的ヘゲモニー）がまだ根強く存在していて、台湾住民の歴史的な記憶がそのヘゲモニーに一定程度支配されているからです。そのため、「台湾」を歴史的な主題として日本統治期の台湾の歴史を語るには、その歴史的な記憶を回復することが不可欠なプロセスなのです。その上で日本統治期の台湾の歴史の意義を論じ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ります。

一、歴史的な記憶の錯乱——台湾の歴史教科書の争議から

近年、台湾の歴史教育をめぐる議論に関しては、2014年から2015年までの2年間、歴史教科書の教育綱領の調整、台湾の教育部（日本の文部科学省のような中央政府機関）による「わずかな調整」の議論がもっとも注目されています。台湾史の部分ですが、そのいわゆる「わずかな調整」は、歴史学科の専任教師、あるいは中央研究院の歴史の専任研究員のような専門家は一人も参加していなかったという状況の中で行われたのです。実際に調整を主導したのは、専門家以外の人によって結成されたグループであり、歴史の教育綱領の調整が正常なプロセスによらず、そして改訂の過程も公開されずに進められたのです。専門家の意見を尊重すべきだ、正常なプロセスによって進めるべきだと言ったような批判的な声に対して、教育部の官僚は既存の錯誤を修正しないで、批判する側の要求を異なる史観・歴史観を尊重すべきだ、あるいは多元的価値を尊重すべきだというふうに

ごまかそうとしています。

台湾の歴史的視点から見れば、現在、台湾の住民の多くは、その祖先が台湾に移住する時期は同じではなく、異なる家族にも異なる歴史的、文化的背景があります。これは台湾の多元的文化の資産であり、台湾文化、歴史の内容を豊かにするものです。しかし、多元的な歴史記憶だからこそ、ある民族 (ethnic group) の記憶を他の民族の記憶に無理矢理に押し付け、さらにそれを台湾唯一の真の歴史的記憶として語らせることは、暴力というだけでなく、台湾の多元的文化への不敬です。換言すれば、もし多元的文化、多元的価値を尊重するというような理由で、台湾の過去の歴史的事実を歪曲する、あるいは改竄するなら、そのような行為は台湾の多元的歴史、多元的文化を破壊するものだと、我々は強く批判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1945年以前の歴史的な脈絡においては、第二次世界大戦の歴史に関して、当時台湾島の人々の記憶と中国大陸の人々の記憶は同じではないはずです。当時の台湾人の多くは日本国の国民として連合国や中国の軍隊と戦い、1944年から終戦に至るまで連合国による空襲の脅威と被害を受けていたのです。それに対して、中国大陸の人々は連合国の一員として、あるいは中国の視点から、対日抗戦（日本の侵略に抵抗する戦争）を行っていたのです。この二つの歴史的な記憶は、勿論、違うはずですが、「教育綱領調整争議」（教育綱領の調整をめぐる議論）の問題点の一つは、当時の中国の歴史的経験を、台湾の歴史のモデルにし、当時中国と台湾との存在しないあるいは僅かな歴史的関係を強化して、なるべく当時の台湾の住民の歴史的経験を弱体化・消去することにあります。

前述した調整の方法は、歴史の改竄だけでなく、歴史教育の基礎が歴史事実にあるという歴史学の価値を損いました。基本的には、歴史教科書における中国現代史の脈絡には、当時の中国が日本と戦った歴史的事実、あるいは中国大陸に行って対日作戦に参加した台湾人やアメリカ人の史実を表すのが適切であり、それは歴史的事実だと思います。その一方、台湾史の脈絡から考えれば、当時台湾人の直面した大空襲についての歴史を表すこともすべきです。これこそ、当時の歴史的事実と歴史的経験を尊重するやり方であり、台湾住民の日本統治期に関する歴史的記憶の回復を可能に

す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しかし、台湾の歴史教育は、長い間中国を主要な軸にして展開されたため、初期の歴史教育では、教科書には台湾史の登場する空間がなく、中国史がその空間を独占することとなりました。高校の歴史教科書に台湾の主体性が次第に出てきて台湾史の比重も増加しましたが、台湾史の教育を受けたことのない世代——現在の30代～60代の世代にとっては、台湾史は馴染みのないものです。その世代に属する人々が学校教育を通じて学んだ歴史知識は、「両蔣時代」（蔣介石と蔣経国の統治期）における大中国を中心にした歴史教育の産物であり、ある程度、台湾人の歴史的記憶を抹殺する歴史教育です。台湾を歴史の研究領域とした論説や研究が漸く形成したのですが、「教育綱領調整争議」の中の一つの争点は、政府の調整によって台湾史の脈絡に中国の歴史を強引に入れようとしたところにあると思います。それには時空間の錯乱を引き起こしやすい動きだけでなく、嚴重な歪曲が生じてしまう恐れもあります。その調整では、台湾史の脈絡の中に1944年と1945年に中国で日本軍と戦った台湾人の歴史が意図的に過大視され、強調されると同時に、当時、台湾島の住民が同盟国の大空襲を受けた歴史的事実がおろそかに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それは明らかに歴史の時空間の置き方を誤るものであり、台湾の歴史的事実を尊重するのではなく、台湾の多元的歴史、多元的文化的状況を抹殺するものになります。このような論述の方法は、「両蔣時代」の歴史教育とまさに呼応し合う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ます。

私の故郷にある有名な国立高校に関するエピソードがあります。先輩からお聞きしましたが、かつてその高校の試験に「第二次世界大戦の時、どの国の戦闘機が台湾を空襲したのか」という問題が出ました。その時、その題目に対して生徒だけでなく教師の何人からも、台湾を空襲したのは日本に違いないという答えが出ました。歴史の観点から見れば、極めてデタラメで理屈に合わないことが分かります。歴史教育の基本的方針を無視すること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前述した教育綱領の調整によって生じた混乱は、この話に比べてそんなにおこがましいことではないのですが、ある意味で自分の価値観とイデオロギーで他人の歴史的記憶を歪曲する行為で

す。それは台湾の歴史と台湾文化の多元的・多源的な特色を尊重しないことであり、多元的価値の共存と発展の阻害となります。

台湾史の立場から考えれば、1944年から1945年まで日本がすでに台湾の制空権を失ったために連合国による大空襲の脅威にさらさ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を現在の台湾人に提示する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であり、それは歴史的事実です。その大空襲で多大な損害を被ったことも歴史的事実です。2015年に台湾において台湾大空襲の歴史に関する写真などの展示会には、台湾の歴史教育の重要な意義があります。改めてかつてあった重要な出来事についての記憶を回復し、そして台湾島を舞台として歴史記憶を構築しない限り、多元的な歴史記憶の再現は不可能だと思われます。2015年の展示会の会場の一部となった台北と高雄の両地は、日本統治期の政治経済、工業、軍事の要地であったため、無惨な空襲を受けました。展示会を通して過去の歴史を認識すると同時に、改めて台湾の多元的歴史を知る機会を獲得しえたことは、過去何十年間の政治、文化、そして社会の改革運動を通じて手に入れた貴重な成果であると、我々は考えるべきな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もし、歴史教育がその成果を守って大事にしなければ、逆に今回の教育綱領の調整のように、政治的なイデオロギーが歴史学の専門的な見解と意見を圧倒し、集団的な記憶を削除したり、異なる歴史的脈絡を強引に入れたりすることは、非常に残念なことです。

二、日本統治期を評価する二重変奏

日本統治期の歴史も台湾の歴史の重要な一環であり、それも教育綱領調整の議論の大部分を占めています。台湾の歴史教育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に対する評価をめぐる中心的な議論にとって最も重要なのは、いかにその植民性と近代性という二重変奏に直面するかという問題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2000年以前において、台湾の歴史の無視と不足は長年の問題でした。1990年代後期に改革の動きがありましたが、具体的な政策は2000年以後実現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改革の前、歴史教育の中の日本統治期については、主に植民政策の搾取性の一面しか反映されずに、社会、経済、文化の発展が見逃されています。

清国の前近代的な体制に対して当時の日本は近代的な帝国であるため、台湾を帝国の領土に収めた後、統治方針の一つは、台湾を大日本帝国勢力の一環として社会、経済、文化共同体を積極的に形成することでした。この方針に従えば、経済面においては、近代資本主義的な基礎建設、例えば関税、尺度の基準、貨幣などは、日本本土と同じような方向へ発展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また、土地調査や旧慣調査などの基礎調査も、植民地統治の需要に応じて展開されたのです。このような基礎建設、制度の確立及び行政調査の事業が、前近代から近代社会へ発展した台湾の歴史的発展に決定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ことは、否定できません。特に鉄道と道路の建設は、台湾が一つの経済共同体になる要件であり、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非常に重要な歴史的な発展です。

その一方、日本統治者は効率よく統治するために、基礎教育及び職業教育に相当な力を注ぎました。これは、統治者の利益を第一義的に考える政策でありながら、台湾の近代化と文明化にプラスの影響を与えたのです。近代的文明を導入すると同時に、近代の自由、民主、人権及び文化も次第に重視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その結果、台湾のエリート層は、日本の統治政策に不満を抱き、批判をはじめました。実に日本の推進している近代教育こそ、その不満と批判の知識的、弁証法的な基礎を提供したのです。言い換えれば、植民性と近代性は対極的ではなく、並行的、そして弁証法的になった可能性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三、「抗日」の意味を再考する

前述のように、台湾では日本が近代教育政策を導入した後、日本の植民地統治政策に批判・抵抗する可能性が生じました。それは1895年における台湾の土地と自分の家族を守りたいといったような素朴な考えから生じた武装「抗日」の行動とは本質的には異なっています。しかし、「抗日」と政治的な抵抗の間にとどのような関係があ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は、注目に値する問題だと思います。

この問題に関しては、「抗日」の意味を改めて確認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これは一般の「抗日」（日本帝国の侵略に対する中国の抵抗）の意味と異

なり、台湾での「抗日」は、朝鮮の人々が日本統治期に行った抵抗と近い意味をもっています。朝鮮半島の状況と照らし合わせて考えてみれば、このような「抗日」を日本統治への抵抗、あるいはより明確に言えば、日本統治を離脱して台湾の主体性を追求し、中国とのつながりを一層深める行動とみなしても問題ないと思います。問題なのは、1920年代から1930年代において台湾の政治エリートによる台湾の植民地政策に対する批判と抵抗は、同じような様相を呈したか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より深く考察する余地があります。簡単に言えば、日本から離脱して中国へ復帰すべきだと提唱する少数派以外、当時台湾の政治エリートによる日本の植民地体制への批判、あるいは改革を求める訴えが、「抗日」と言えるかどうか、再考する余地があるのです。

日本から離脱して中国へ復帰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政治的な実践は、しばしば中国本土に入って中国の政権や体制と協力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行われていました。ただし、このような実践は1937年以後、ようやく中国政府に受け入れら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その一方、台湾植民地解放、日本離脱を強調したのは、主に台湾共産党であり、その政治的主張は日本による台湾植民地統治の打倒、台湾共和国の建設です。それは台湾共産党の独創ではなく、第三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コミンテルン）の脈絡から考えるべきです。レーニンもスターリンも、植民地の解放と独立への反対はマルクス主義に反すること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そのため、第三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の決議にしたがい、中国共産党も日本共産党も、あるいは当時、日本共産党の指導下にあった台湾共産党も、植民地解放運動によって、日本から独立して台湾共和国を建設すべきだと主張します。この状況から見れば、左翼運動家でありながら日本から離脱して中国に復帰することを目指す人々は、日本統治期の台湾の政治運動においては比較的に少数であったことが分かります。多くの人々は異なる政治アプローチをとっています。左から右まで、異なる政治的なスタンスをとる人々、例えば蔣渭水、林獻堂、楊肇嘉などの政治的指導者は、異なる道を選んで別の側面を見せてくれたのです。

この側面の発展において、抵抗運動は日本の台湾統治、あるいは台湾が

日本帝国に従属することを認めました。換言すれば、このような政治的抵抗は、植民地統治とその体制を批判するだけでなく、植民地統治体制を放棄すべきだと強く要求したけれども、日本の台湾統治を転覆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から離脱すべきだと主張しなかったのです。これと前述した「抗日」の主張とは、根本的な差異があります。そう考えれば、それは、日本からの離脱を主張する「抗日」と、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を支持する主張との間に位置付けたほうがふさわしいと思います。「抗日」というより、むしろ政治的抵抗といったほうが、当時台湾の政治的スペクトルをより明らかに表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ます。

1914年、台湾の政治エリートによる明らかな政治的抵抗の最初の主張は「同化」でしたが、核心的な要求は、台湾と日本の文化の違いによって行われた植民地統治に対することであり、その潜在的な目標は「六三法撤廃」だと思われます。しかし、なぜ台湾総督府は、植民地支配者の利益にかなう日台同化を主張する「同化会」を弾圧したのか？ それは、台湾のエリートが「同化」という要求を通じて当時の植民地体制を批判し、「六三法体制」が規定する不平等な日台関係を改めようとする動きに関係しているからです。同化を提唱する「同化会」さえも、総督府によって弾圧されたため、「六三法撤廃」の運動は日本本土の東京に移らざるを得ませんでした。大日本帝国憲法の下で、東京にいる台湾エリートの方が言論の自由、結社の自由を有していたからです。また、当時日本憲法と近代思潮をよく理解している台湾エリートも日本に滞在していました。

「六三法」が台湾と日本の文化的、習俗的な差異から生じた異なる法律による支配の根本的な依拠となっていたため、「六三法撤廃」は日本の法律の効力を台湾にも及ぼすという主張になります。いわゆる「内地延長主義」の性質を帯びています。しかし、第一次世界大戦後の民族自決の風潮が強くなっているなか、多くの台湾エリートが「六三法撤廃」の主張から、台湾の植民地議会設置の主張へ転じました。それは、民族自決運動とは言えませんが、台湾人としての自覚を意味しています。そして日本と異なる時空間に置かれた台湾の特殊性を守って重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台湾人の意志もその転換から読み取れます。たとえ台湾と日本を徹底的に融

合させ、台湾人も帝国議会の議員として選出される権利を手に入れても、人口の比率から考えれば、帝国議会においては台湾の特殊な需要にふさわしい法律の制定も極めて困難だと思われます。それに対しては、「六三法体制」をそのまま存立させ、ただ台湾住民の選出した議員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る台湾議会の総督の立法権だけを移譲させ、台湾議会によって台湾の法規制度を決定するのは、台湾の住民にとって比較的有利なことです。しかし、この主張に現れている台湾人として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は、日本離脱を主張する政治運動と本質的な差異があります。

四、台湾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の複雑性及び朝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との差異

日本統治期の台湾人は、基本的には、台湾人と日本人の違い、あるいは本島人と内地人の違いを少なからず感じていました。その中で、台湾独立に賛成かどうかを別として、日本離脱を主張する人々の考えでは、台湾人が日本の国民であるべきではないと認めた上で、台湾人と日本人の差異を認識していたのです。それに対して、前述した政治的抵抗のアプローチを取る人々は、日本国民として日本帝国という領域において、本島人と内地人、あるいは台湾人と日本人の差異を理解していたのです。後者は、台湾人と日本人の差異を認識しつつも、国家のレベルでは大日本帝国の国民として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を持っています。

一方、台湾人は日本の植民地政策を強く批判すべきではない、議会設置請願運動に反対、台湾人は日本人の統治に協力すべきだと主張する人々も、台湾人と日本人の差異をある程度まで認知しているわけです。最も明白に体现したのは、辜顕栄です。彼は、台湾人の置かれた状況、すなわち日本人との差異や法律上の差異を意識しています。そのような歴史の時空間の脈絡から考えてみれば、なぜ彼が台湾公立台中中学校（現・台中第一高級中学）の創立に経済的な援助をしたのか、なぜ日本本土で台湾総督府の統治政策を批判し続ける「台湾青年」に運営資金を提供したのか、なぜ彼と台湾総督府の官僚との会談が長年通訳を介して行われていたのか、そして彼が台湾で漢族文化の保存と発展に力を入れ、中国の漢文研究者を台湾ま

で招待して漢族文化の発展を推進したのか、このような一連の問題が少しずつ理解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それは、一定程度まで、台湾人としての植民地被支配者が支配者から受けたある種の悲しき傷跡、あるいは悲しき烙印の表現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

この他、日本統治期では台湾人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にもう一つの特殊な現象があります。それは、台湾人には、近代のネーションと血縁によって形成した前近代的な「民族」に対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とを区分しているという点です。言い換えれば、たとえ台湾と日本は同じ国家であることを認知していても、台湾人の心の中は、漢族と文化的、あるいは血縁的なつながりを持っていて漢族と同じ民族だと想像しています。それは想像ですが、現実においてはそのような民族の想像が効果をもたらしたのです。たとえば、林獻堂という人物は、台湾人は日本の国民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に異存ありませんが、「祖国事件」（上海での講演で中国を祖国と称したことが台湾総督府に知られて台湾の愛国的日本人から猛烈な批判を浴びたという事件）の原因は、やはり彼の心の中に漢族というような血縁的な、あるいは前近代的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が存在することにあると思います。

ここまで申し上げたのは、日本統治期において台湾人の多様で複雑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の状況です。もしこのように複雑な状況を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に照らし合わせてみれば、一層面白くなります。たとえば、台湾文化協会と台湾民衆党の指導者である蔣渭水の「臨床講義」（彼はもともと医者なので「臨床講義」というタイトルをつけたのです）という文章があります。その中では、漢族文化から色々継承した台湾文化について深く認識され、「炎黄子孫」というような概念や脈絡を台湾文化が伝承する重要な一環として語られています。しかし、彼の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は、近代の西洋文化です。換言すれば、台湾文化がかつて漢族文化からいろいろと伝承したけれども、将来の発展のために西洋文化を大量に導入すべきだという立場です。それは我々がよく知っている漢族文化を強調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と明らかに違います。日本統治期では、漢族文化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を持つ人、あるいはその伝承を認めた人であっても、必ずしも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に反対したという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逆に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に反対する時に、しばしば依拠したのは漢族文化ではなく、

近代の西洋文化が内包する価値観です。

朝鮮人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と比べてみると、台湾と朝鮮には日本統治期においてある根本的な差異があります。日本併合から朝鮮人が亡国の痛みを抱えていたのに対して、台湾人はそもそも国家のない人々であるため、その亡国の痛みは激しくないのです。朝鮮人にとっては、朝鮮、あるいは韓国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を持つことが、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への反対を意味すると同時に、日本の国民であることへの不満を示しています。そのため、朝鮮人と日本人との平等、あるいは朝鮮人の地位向上への追求は、朝鮮・韓国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立場では批判すべきです。しかし一方、台湾では植民地議会設置の主張が日本統治への象徴的な抵抗とみなされ、日台平等、六三法撤廃なども日本統治に抵抗する重要なアプローチだとされました。この状況は明らかに朝鮮半島の状況と根本的に違います。また、当時の国際情勢も一つの重要な要素です。当時の中国を代表する中華民国と日本の間に正式な国交関係が結ばれていて、1940年代まで中華民国の国民政府は台湾を日本国の領土であると承認していて、台北に総領事館を設置していたのです。換言すれば、中華民国から見れば、台湾人は日本国の国民であり、台湾はその領土であることを認めた上で両国の関係は発展しています。この国際情勢は、台湾人が抵抗する時に必ず影響を与えたわけです。例えば、辜顕栄は日本統治期において総督府の重要な協力者と認められ、当時の日中関係に多大な貢献を果たしました。そのため、彼が亡くなった後、国民政府が褒揚令を授けたのです。もし台湾人は中国人であるという立場なら、それは否定できない歴史的事実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ます。

五、中華民国と台湾に対する日本の戦後処理 及び戦前記憶の再考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戦末期、「一億総玉砕」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が出てきて、その「一億」は明らかに台湾と朝鮮半島の住民を含めた数字です。しかし、戦後の処理では、日本が台湾をその「一億」から除外して、1952

年という時点で日本国の国籍を失った台湾人は、元復員兵への補償、戦時国債や貯金の処理について日本人と同様な扱いを受けられない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そのような状況も、戦後台湾人の戦前記憶の認識と再検討に影響を与えました。それだけでなく、国民政府の態度も強い影響を与えました。1945年以前の台湾人は日本国民であると国民政府が明白に認識した上で、台湾人を漢奸扱いするのではなく、戦犯として処分したのです。しかし、辜顕栄と林獻堂の異なる処分、つまり国民政府から褒揚令を貰った辜顕栄に対して、当時の台湾省行政長官陳儀から見れば、日本統治期に総督府に抵抗した指導者である林獻堂は大日本帝国の皇民であるというような状況は、台湾民間の歴史的記憶との間に大きな亀裂が生じました。それは、戦後初期、台湾社会において頻出した文化的衝突問題の重要な時代背景です。

しかし、指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少なくとも蔣経国時代から、戦前台湾の歴史に対する認識がある程度変化したことです。日本統治期において朝鮮人によって行われた政治的抵抗に対する戦後の韓国政府の評価と異なり、台湾の歴史の限られた教育、あるいはマス・メディアによって伝えられた歴史知識を通して、国民党は「抗日」という枠組みから、日本統治期における台湾人の政治的抵抗を中国大陆での「抗日」と同じように解釈していたのです。そのような枠組みは、ある意味で国民党の歴史解釈と台湾民間の社会記憶とが重大な分岐のない部分です。

しかしながら、問題なのは日本の台湾統治の脈絡に従って考えれば、日本の統治から離脱する主張以外の様々な政治主張、アプローチ、そして台湾総督府体制や植民地政策に批判や反対する台湾エリートの歴史的な痕跡を、ただ中国本位の「抗日」で解釈するのなら、逆に歴史の多様な側面を見逃してしまう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点なのです。